

少数文学与结舌：德勒兹的语言褶皱论

庄鹏涛

【摘要】德勒兹反对结构主义语言模式，认为语言的少数化或者弱势化是文学革命的条件。以此为基础，德勒兹提出了文学机器、少数文学、让语言自身口吃的观念。三者从语用学的层面揭示了语言内部纠结的权力结构以及对抗的出路，对于我们深刻把握德勒兹的文学观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典型的语言褶皱运作方式，语言的少数之变能够帮助我们反思先锋文学作品的革命性，从微观政治学的层面重新认识个性化语言风格的作用。

【关键词】褶皱；文学机器；少数文学；结舌

【作者简介】庄鹏涛(1984-)，男，河南周口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文学博士(河南 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封)，2020.2.110~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吉尔·德勒兹的‘褶皱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YJC760125)阶段性成果；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系谱学视阈下巴洛克概念流变研究”(2018CWX027)阶段性成果。

褶皱是德勒兹后期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与许多其它概念(比如：根茎、游牧)一样，具有鲜明的德勒兹式风格印记，兼具形象性和思辨性。它既具备形象化的直观可视性，又具备非形象化的可读性和思辨性。它既是一种解构的策略，同时也是一种建构的方法。概括而言，作为一种方法，褶皱理论以褶皱为特定的思想意象，突出强调显与隐的二重性和折叠—展褶—再折叠的三重思想操作，其精神特质在于凸显差异，为流动和生成解除定见的枷锁，于表面的坚实性之中发现潜在的不稳定性，有意识地抵制和批判规范、惯例，以及任何形式上的规定性。折叠—展褶—再折叠既是物质变化的式样、知觉形成的过程、主体化的方式，同时也是文学作品、绘画和影像的具体操作。

褶皱在文学中的具体操作表现为语言褶皱，所谓语言褶皱是指一种少数化的语言表述方式，“结舌(口吃)”是其典型的文化症候。在浅显的层面上，每一位作家会自觉地对语言进行折叠和加工，形成自

己的特殊语言，带有作家签名的语言特殊用法就构成了一种语言褶皱，它标志着文字风格的特殊性和差异化；在深层的意义上，语言褶皱在一种普通语言内部构造一种少数用法，语言褶皱志在消解普通语言的表达范式，解码语言，然后重新折叠，开凿出一种“在语言中的怪异语言”，穿越重重的文法堆叠，建构一种企图朝向无典型、无文法的表达，就如企图朝向语言的终结(其中诸如马拉美的书、贝玑的重复、阿尔托的气息、卡明斯的无文法性、伯勒斯的折痕、cup-up与fold-in，再加上鲁塞尔的增殖作用、布里塞的歧出、达达的拼贴……)。①语言褶皱并不关心语言的本质，重在强调语言的运作，它使语言不断地折叠—展褶—再折叠。在突破语言惯例的种种樊篱，展开语词的惯常折叠方式时(语法结构、能指与所指的无意识链接、词语的固定属性、习以为常的转喻等)，语言褶皱重新为语言结域构造一种具有革命性和创新性的语言。

关于德勒兹的文学观，学界多有探讨，学者们从

不同角度试图归纳出德勒兹文学观的某个侧面,讨论涉及少数文学、解辖域化、文学生成论、文学机器。^②而过现有成果,多限于局部的分析考察和研究,对于德勒兹的少数文学、文学机器、解辖域化多为分散性论述,未能从整体上把握。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以褶皱概念为统合点,对相关概念作出全面深入的探讨。

一、文学机器的褶皱运作方式

德勒兹认为文学作品是机器,“现代艺术作品是一部机器,并作为一部机器而运转”^③。为什么称文学作品为机器?在德勒兹看来语言符号的终极指涉对象并非意义。如果把意义看作语言符号的所指,就假定语言符号为意义的表达手段,语言符号只是意义的表征。这种符号—意义观预设了意义的先在性,仅仅把符号看作是一种媒介,一种表征手段,与德勒兹一贯批判的表象的逻辑不谋而合,所以德勒兹将艺术作品看作机器,反对意义—符号的二元论和能指—所指的符号论。坚持文学机器的运作功能,将意义看作是机器生产的效应,而不是作者的观念产品。“与逻各斯相对立的,与那些我们必须从其所归属的总体之中去发现其意义的器官和工具相对立的,正是反—逻各斯、机器与机器装备——它们的意义(所有那些我们所意欲的)只依赖于功能,而其功能,只依赖于相互分离的部分。现代艺术作品没有意义的问题,它只有一个用法的问题。”^④

将文学作品看作机器,其目的在于摆脱符号—意义的二元论限制,因此讨论一部机器的方式不再是寻找意义,而是讨论它由什么构成,如何运转,依照什么方式运作。文学机器的组合方式有很多,比如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客体机器、共鸣机器和力量运动的机器;卡夫卡文学机器中的日记、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三个组件。无论哪种机器组合,文学机器始终绕不过语言,绕不过语言褶皱的运作:折叠—展褶—再折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运作方式。

在文体语言的层面上,折叠—展褶—再折叠就是融入语言,然后使语言敞开,开放出一些空白领域,通过重新折叠(refold)催生新的感觉和效应(并非意义)。当文学与语言学脱离关系之后,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文学存在。

折叠—展褶—再折叠分别对应于文学生产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要想熟练地运用一种语言来“表达”,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通晓某种语言,掌握基本词汇和句法,也即在“折叠”的意义上将语言折叠入生命之中,与那些构成人的力量相结合(比如理解力、想象力、感知力等),从而形成一种内在化的生命—语言褶子,在这一阶段语言表现为一种工具性的语言。第二,在折叠的基础上展开这些语言的褶子,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使用者逐渐从语言学徒转变为语言的革新者。展开语言的褶皱就是要展开语言闭合的回路,打散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惯常的联接,使语言脱离原有的领土,开始浮动或者漂游。现代诗歌的形式本身就具有展褶的意味,它将前后连贯的语言打散,每一行以寥寥数语突出显示语法的存在或者词语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非语法的形式语法。就语言操作层面而言,展褶就是消解词与物之间的约定俗成的联接,运用变形、变异、转换等手法,迫使词语作为词语而现身。第三,再折叠就是将原初的语言褶子打散重新建立新的联接,形成新的句法或者新的表达方式。结舌(口吃)和饶舌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反映了再折叠的两个不同向度,结舌是有意地停顿,保持这种再折叠过程中褶皱自身的操作痕迹,因为它所突显的不是现成的或者初始折叠意义上的普遍性,而是展褶之后再折叠的僵硬和困难;饶舌则是通过遮盖这种展褶的痕迹而实现再折叠的效能,它将褶子密集化,超出一般的语言与舌头之间的惯常联接速度,而以超速的形式实现了再折叠。

折叠—展褶—再折叠的操作还具有第二层意义,体现于文学接受的层面上,阐释即是文本褶皱的

展开。一部完成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包含着无穷褶皱的整一,它像“单子”一样包含着一个潜在的世界。读者的阅读与阐释就是剥开作品的层层包裹,通过自己的头脑以及身体所具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而实现这一可能的世界。所以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一个视角展开作品的褶子,掀开其神秘的面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本存在着终极的统一的意义,存在着像作者一样理解文本的“标准的读者”,因为折叠—展褶—再折叠是一种操作,它通过运行而产生效能。意义只是文学机器的生产效果,随参与者的不同而形态各异。读者是文学机器成功运转的一个重要要素,或者使用德勒兹的语汇来说,读者随着作品一起生成。人在阅读中生成读者,文本在被阅读中生成作品,作品在与读者的结合中生成一种新的感知模式或者导向一种感官功能,借助于这种感知方式,文本的世界才渐渐展开,就像普鲁斯特所说的日本折纸术游戏一样,“他们抓一把起先没有明显区别的碎纸片,扔进一只盛满清水的大碗里,碎纸片着水之后便伸展开来,出现不同的轮廓,泛起不同的颜色,千姿百态,变成花,变成楼阁,变成人物,而且人物都五官可辨,须眉毕现”^⑤。打开文学作品的包裹就是将文学作品投入读者经验的水池中,它会随着水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变化出不同的形状。

二、少数文学、解辖域化与褶皱

在《卡夫卡——迈向少数文学》一书中,德勒兹与加塔利通过对卡夫卡的研究,提出了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⑥的概念,并界定了少数文学的三大特征。关于少数文学的特点,国内学者已经有较多的论述,本文不再就这一问题详细展开,将更多集中于语言的解辖域化与语言褶皱之间关系的讨论。

勒兹和加塔利明确地界定了少数文学的性质,他们认为少数文学不是用某种次要语言写成的文学,而是一个少数族裔在一种主要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少数文学的重心不在于所使用语言的性质,

因为即使在“小语种”语言之中也存在着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而在于主要语言内部的特殊操作,或者语言内部的“少数”用法,它运用变形、倒置、叠加等手法将语言标准打乱,使其流动,启动变革,“少数”一词是指任何在通常被称为重大的(或业已确立)的文学的内部产生的文学的革命性的条件”^⑦。

德勒兹研究专家 Ronald Bogue 在《德勒兹论文学》中仔细辩明了少数文学的含义:之所以称之为少数文学,原因并不在于它是特定族群的文学(虽然文学的政治面向在‘小众文学’中极为明显),也不是因为它是少数族裔的文学(虽然少数族裔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中,语言变形的影响通常很大),而是因为它是少数用法的文学,是对语言中支配性结构的“少数化”(minorization)^⑧。由此可见,德勒兹和瓜塔利所说的少数文学其重点在于语言的特殊操作——少数化,透过强化语言中的某些特质而使语言“解辖域化”。

“少数”一词不再是某些特殊文学的修饰语,而是指任何伟大文学内部每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的存在状况。^⑨倡是少数文学的解辖域化倾向如何具有政治意味,为何具有革命性?或者说既然少数文学的首要特点在于语言的解辖域化,那么少数文学的革命性又是如何体现在语言的解辖域化之中?

首先要理解何谓解辖域化,解辖域化的实质在于脱离领土的运动,也即摆脱拘禁(有形或者无形的),脱离先前束缚和约束的环境;或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摆脱一种安逸的、怡然自得的状态,有意脱离习俗和惯例,以一种省醒的态度对待当下,认识到当下环境之中潜在的种种框架和约束。令人感到吊诡的是,这种约束往往是无形的,附着于无意识的常识和习以为常的惯例之中。如果不局限于语言学的意义,将“语病”看作是一种文化症候,它恰恰能够传达出“解辖域化”的效果。与一般语言病理学上的“语病”不同,文化症候的“语病”是一种故意的违背,它不是无意之中犯了“错误”,而是故意违规或

者僭越,以一种陌生化的手法使得惯常的“语法”窘迫不堪,使其程序化和条例化边界在“逾矩”的压力下现形,从而暴露出各种无形的“辖域化”机制。因之,德勒兹和加塔利在阐述少数文学的特点时反复提到“语言中的外国人”这一比喻,“艺术家就像是一个异国的公民,身处这个国家,但却对它毫无所知,不放在心上”^⑩，“伟大的作家总是像他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中的外国人,即使这是他的母语……他是自己语言中的外国人:他不是把另一门语言和他自己的语言混在一起,而是在他自己的语言之中创造出一种并非预先存在的外语”^⑪,其目的就在于提醒对语言时刻保持一种反省意识,自觉地认识到潜在的种种“辖域化”的机制,进而发掘出一条“解辖域化”的逃逸路线。

其次,“解辖域化”虽然具有某种变革的能力,能够在既有的规训机制下为生产性能量提供出路,但是这种“解辖域化”意识也许仅限于宏大的社会机制层面,“语言的解辖域化”作为一种微观操作,如何体现革命性呢?这将导向语言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讨论。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的第四章“语言学的公设”中发展了奥古斯汀的语言—行为理论,其核心观点在于:语言活动不是一种结构化的内部选择操作,就像一般语言学家所说的在普遍语言之中选择合适的词语,组装成某一特殊的言语,以此来表达个人的情感或者想法。而是如“言说—行为”理论家所说的,语言是行动的方式、做事的方法。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语言并不传达信息,而是像发号施令一样的行为,在语言和言语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任何语言都预设了行为,“对语言的意义和句法的界定不能独立于它所预设的言语行为。”^⑫“语言不是用来被相信的,而是用来被服从和使服从。”^⑬

德勒兹和加塔利反对结构语言学家的观点,认为不应当在语言和言语区分的基础之上研究结构化的语言,这种语言观假设语言具有恒常不变的特性。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些看似不变的语词性

质、固定的词语组装只是语言行动模式的次要特征。语言的标准用法(“标准”语言)处处浸透着社会的支配性秩序,它纠正差异,排除异质,在连续变异路线上截取一部分,称其为“合适的”和“合理的”,抑制语言的变异与生成。“在成为一种句法的标记之前,一条语法规则就是一种权力的标记。”^⑭语言的辖域化就是一种套路化、程序化的组装,它以固定的折叠方式将语词束缚起来,以一种“编码”的策略赋予某些语汇和表达方式特权,从而约束了语言,遮盖了语言的流动、变化、漂浮的本性。相应地语言的解辖域化就是解除语言的这种权力关系,将褶皱展开(unfold),“变形是隐喻的死对头。在词语的展开幅度上,不再有本义和引申义,只有各种状态的分布。一个事物和其它事物都只是沿着逃逸路线(line of escape)脱离领土的音响,或者词语所巡视的强度。问题并不在于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之间有哪些相似点,也不在于如何游戏文字……问题在于变异的过程。”^⑮

最后,语言的“辖域化”机制本质就是一套固定的“语言折叠方式”,它赋予某种语法以特权,通过这种方式它不仅直接控制了语言,而且间接控制了依赖于语言的社会经验,从而制造出社会秩序所能容许的“理想的人民”。如果要在某种话语机制内顺利地表达自己、与别人沟通就必须进入这种体系之中,也即是自我折叠入语言环境之中,此乃折叠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但是不易察觉,当“自我”折叠入语言环境之中形成“我”,能够表述“我”的同时,语言也以同一种方式反向折叠入自我之中,这就形成了德勒兹在《福柯》一书中所说的域外与域内的双向折叠。当语言被折叠入自我的时候,“我”也被“语言”所形塑,潜在的规范机制和标准也就在无形之中渗入“我”,以至于对于“我”的自我认识也是在标准化的语境下被制造出来。比如“我”与“他人”之间的对比与映照。“我”被构想为一种自由表达的“自我”,但是这种表达总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权力、秩序、规范、标准与语言一道被折叠入“自我”之中,因之“展褶”或者“去褶皱”,虽然表面上看它的对象是标准用法的限定与支配,以及非标准用法的变异,但是早已经卷入一种权力关系之中,因此“语言的解辖域化”“语言的展褶”总是一种政治行动。所以德勒兹和加塔利说“少数才可能强大,才可能有革命性。憎恶所有那些巨匠的文学”^⑩。

三、让语言自身口吃

德勒兹和加塔利一再强调,少数(弱势)语言、少数(弱势)文学,并不是双语现象,或者多语现象的情况。它所说的并非两种或者多种语言之间不断地彼此过渡、多种语言混合的情况,这样考虑“少数/弱势”固然很容易,但是在这样一种双语过渡之中,每种语言仍然保持着各自的平衡系统,它们的混合只是一种言语现象,并不能打破它所依据的语言系统的平衡性。“不存在两种语言,而只有对于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可能的处理方式。人们对于变量进行处理,有时是为了从中获取常量和恒常的关系,有时则是为了将其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前者是强势语言,后者是少数语言……强势的和少数的所界定的不是两种语言,而是语言的两种用法或功能。”^⑪

少数语言和强势语言(少数文学和强势文学)并不是两种语言(文学),而是在同一种语言之中语言的少数用法和语言的普遍用法之间的差异。在强势文学内部缔造一种少数文学,它不依据于少数族裔的语言,而是语言的特殊用法,通过强化语言中被压抑的部分,迫使语言“解辖域化”,通过变量来抵抗一切作为“规则”“标准”的常量。“利用自己语言内部的各种语言,为了少数族裔而运用自己的语言,并且强化运用,凸显这门语言当中压抑和受压抑的对立特点,找出不属于文化之处和欠发达之处,找出语言得以脱身,动物得以依附,配置得以衔接的语言学的第三世界……学会创造一种弱势之变。”^⑫

少数用法是语言之中的变形力道的深刻加剧。

这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它不再遵从结构性的析取和选择,而是沿着一种变化、生成的路线飞奔,摧毁整体,然后析取出词语本身的变异的力量。在自己语言之中创造一种外语,也即是在主要语言内部制造少数用法,使语言本身变得口吃,这种结舌,不是故意地违背表意的连贯性,因为语言不再取向于意义,而是取向于语言本身的动能,它是一种不断变异的曲线,是各形各色的褶皱,不断地分叉、弯曲、偏离。德勒兹以一种动态的语言,取代了结构的整体;以一种生成的语言,取代了静止的语言。普鲁斯特说:“杰作是以一种外语写成的。”这和口吃是一回事,然而,是语言自身的口吃而并不单单是言语之中口吃。作为一个异乡人,置身于自己的母语之中,而并不仅仅是说着另一种不同于母语的言语。作为双语者、多语者,但却是在同一种(甚至不带有方言或土语的)语言之中。^⑬

德勒兹认为伟大的作家在自己语言之中创造了一门外语,发明一种使语言产生疏离的方法,这种外国语也即是语言的少数用法,同时,德勒兹还强调外国语和口吃是一回事,口吃并不是指使用语言过程中的口吃,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口吃,它使语言本身口吃。在《批评与临床》一书中德勒兹有一篇专门论述文学语言的文章,其题目就是“他口吃了”。在这篇文章中,德勒兹区分了“口吃”的三种不同情形:呈现性的口吃、指示性的口吃、语言本身的口吃。^⑭

呈现性的口吃和指示性的口吃都是作家处理人物说话的方式,这些方法都只能使言语口吃,而最令德勒兹感兴趣的是语言本身的口吃,所谓语言本身的口吃不再是作品中人物说话时口吃,而是作家本人变成了口吃者。他让语言本身口吃:一种情感的、强度的语言,不再是说话者装模作样。德勒兹曾在很多地方列举了语言口吃的例子,比如美国诗人康明思(E. E. Cummings)的一些独特表达:“他舞动他的做”(he danced his did)和“他们走着他们的来”(they went their came)。同样还有其它形式的变异,他做

出了他的舞蹈(he did his dance),他跳他的舞(he danced his danse),他跳他所跳的(he danced what he did)……,^①这些不规则的、不合语法的变异。在德勒兹看来,将语法变量置于连续流变状态之中的理想状态,它迫使句子不断地变异,每个词都影响着前一项,不断地分叉、变化。这些不规则的表达正是语言本身口吃的理想特征,它本身构成了语言的解辖域之点,“使语言趋向于其要素、形式或概念的极限,趋向于一种接近语言或超越语言的状态”^②。

由上述例证可以看出,让语言口吃也即不断消解语词的表面,使其完全开放,让人注意到词语在句子之中被遮掩的多重意义,让人看到语词自身变异的力量。同时也创造一种处于生成过程之中的句法,这一句法创造在语言之中生成了一种外语、一种不平衡的语法。语词的自我指涉、语词的游戏和不平衡的句法,这是口吃的双重维度。口吃、结巴,使语言结巴,使语言不那么顺畅,变得窘迫,困难不堪,以至于断断续续。这不是表意的需要,而是创造性的口吃,它摒弃了任何符合语法的外观,以便使永不停歇的生成、变化机制自然地出现在词语的呼吸之中。语言的口吃就像一个说话气喘的人,他不是因为疾病而无法顺利说话,而是因为意识到“惯用”“通俗”“主流”语言自身的顽疾,这就是句法顺畅背后对于生成、变异的压抑,而不得不采用的策略,就像是一个不断试探着,找到一个合适的出气口的穴居动物,要打造一个又一个出口。

通过口吃,语言达到它的外部,因为口吃不再是语言内部的一种机制,而是语言超越了极限,解除语言“编码”的武装,解开语言的褶子,以一种新式的编织方法,结成新的褶皱。这并不是一种谵妄的幻觉,因为语言在“编码”之中形成了种种“标准的用法”,这些主流的用法之中寓含着最深沉的权力秩序。消解语言的“编码”,解除这种看似“天然”的褶皱,就能看到“人工”的痕迹,从而在这里呼唤一种新的结域,新的褶皱因而具有解放的能力,他使得新的感性得

以生成。打破语言的“条框”,迫使语言展褶也意味着击穿语言本身的辖域,成为异乡人,在不成句法或者陌生的句法之中发动革命。

结语

通过德勒兹在少数用法、口吃和解辖域化之间的创造性关联,我们可以重新反思先锋文学的先锋性,一般将先锋文学的语言实验看作是形式上的创新,不涉及政治运动。但是透过少数文学的解辖域化,我们看到在语言层面的突破不仅预示着消解语词的边界,打破惯常用法;而且预示着先前规范化的“陈述装置”的崩解。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正是通过“陈述装置”的运作,规定哪些是符合标准的表达,哪些是规范的句法,从而在无形之中塑造了这一秩序所需要的人民。因而打破规范,解除辖域的限制,生成少数(生成一女性、生成一儿童、生成一动物),也就是呼唤着未来的人民。正如拉西妲·特里盖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所论说的:“文学创造在德勒兹看来是用一种语言生产多种语言的事情,这被他叫做在自身语言中的口吃。它是一种能指体系的解辖域化的形式,使作者对自己的语言感到陌生,使作者置身于句法和词汇的生成—他者之中。写作就是在另一种句法之中、在一种语言的应用中掺杂另一套等级制度,在逃避的路线上把写作带到更远处。”^③

注释:

①吉尔·德勒兹著,杨凯麟译:《德勒兹论福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②朱立元,胡新宇:《卡夫卡与文学机器:浅析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文学理论》,《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年第2期;朱立元,胡新宇,《线与生成:德勒兹文学创作的两个主要概念》,《文艺研究》,2012年第1期;尹晶:《作为生命进程的文学:德勒兹(和瓜塔里)文学批评思想概论》,《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葛跃:《艺术符号的生成与潜能:德勒兹文学思想研究》,《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张聪:《少数文学:德勒兹与瓜塔里的表达机器》,《海外英语》,2018年第12期;周雪松:《西方文论关键词解辖域化》,《外国

文学》，2018年第6期。

③吉尔·德勒兹著，姜宇辉译：《普鲁斯特与符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④吉尔·德勒兹著，姜宇辉译：《普鲁斯特与符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⑤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李恒基，徐继曾，桂裕芳，等译：《追忆似水年华》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30页。

⑥中译本《卡夫卡》与《什么是哲学？》两部著作合辑一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以《什么是哲学？》为名出版，张祖建翻译。《卡夫卡》一书的原著副标题为“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张祖建译为“为弱势文学而作”，现今一般通译为“为少数族文学而作”或“迈向少数文学”，本文采用“少数文学”这一概念。此外，随着德勒兹中文译著的不断增多，以及国内学术界对于德勒兹思想理解的不断深化，德勒兹著作中的一些核心概念现今有了较为统一的译名，本文引用时均做了适当调整，比如 deterritorialization 张译为“脱离领土运动”，现今一般译为“解辖域化”。

⑦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里著，张祖建译：《什么是哲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⑧Ronald Bogue, *Deleuze on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96.

⑨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里著，张祖建译：《什么是哲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⑩吉尔·德勒兹著，姜宇辉译：《普鲁斯特与符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

⑪吉尔·德勒兹：《他口吃了》，陈永国，尹晶主编：《哲学的

客体：德勒兹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

⑫德勒兹，加塔利著，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⑬德勒兹，加塔利著，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⑭德勒兹，加塔利著，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⑮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里著，张祖建译：《什么是哲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⑯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里著，张祖建译：《什么是哲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⑰德勒兹，加塔利著，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⑱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里著，张祖建译：《什么是哲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⑲德勒兹，加塔利著，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⑳Gilles Deleuze,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107.

㉑德勒兹，加塔利著，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㉒德勒兹，加塔利著，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35页。

㉓拉西姐·特里盖著，周迈译：《德勒兹美学思想述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0期。

The Minor Literature and the Stutter: On Deleuze's Language Fold

Zhang Pengtao

Abstract: Gilles Deleuze firmly opposes structuralism language concept, he argues that minor language is the condition of literary revolution. On this basis, he proposes the concepts such as literary machine, minor literature, to make language stutter. These three concepts reveal 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interior of language and the way opposing to it from the pragmatics level,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Deleuze's literature view. As a kind of typical language fold operation, the minor use of major language can offers us help to reflect the revolutionary of avant-garde literature, to rediscover the function of individualized language style from micro-politics.

Key words: The Fold; Literary Machine; Minor Literature; Stutter